

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考证

王枫云 刘鉴莹

内容提要:作为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在国运多舛之时破土而出,主动承担起“合一群以振中国”与“促进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历史使命。“研究政治学学理,探讨实际问题,提供政策方案,期于国家政治建设有所贡献”是绝大多数中国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宗旨所在。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的中国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逐渐发展出较为完备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其实际运行也取得一定的成效和影响。在晚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学术生活、学术追求、精神品格及其制度安排,丰富了具有中国本土风格的学术社团文化,是我们今天建设政治学学术共同体时仍需传承与借鉴的历史遗产。

关键词:近代中国 政治学学术团体 学术史 学术社团文化 中国政治学

作为推动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政治学学术团体自其创立之日起就发挥着理论阵地和思想载体的作用。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与政治改革的未来进路,往往成为政治学学术团体探讨、表达与传播的主题。政治学学术团体在研究重大政制问题、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推进国家政治变革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它亦是西方政治学引入中国,推动中国传统政治研究“政治学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进程中不可忽略的力量。故而,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学“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①,尤需对政治学学术团体进行深入考察。

本文尝试经由追溯中国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历史足迹,以揭示其创立缘起与总体概貌,并重点分析其宗旨、特征、运行成效及社会影响,力求完整地再现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生长图景与发展进路,重温其曾经奏响的图强声韵,感受其历久弥新的历史价值。

一、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创立发展及其推动力量

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团体被视为公民自愿结成以进行社会活动的结构和场所^②。社会团体的种类繁多,旨在“联合同志,互通知识,研究学术”^③的学术性社团(学术团体)是其中之一。

① 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参见褚松燕:《政治社会团体涵义辨析:概念比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③ 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第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学术团体一般有完备的章程规定其名称、宗旨、研究范围、活动地域、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制度、会员资格、权利义务。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学术团体具有聚集人才、交流信息、引导研究、普及知识、影响社会的重要功能。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清政府的腐朽使“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①。当此之时,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一系列维新变法的主张。康有为指出:“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②。为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培养经世致用之人才,维新派提出兴学会、办报刊、建学堂的倡议。梁启超在《会报叙》疾呼:“呜呼!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未由哉”^③;谭嗣同也认为“救国必须立会”,并把广开学会作为救国救民的“第一要义”^④。在这些观念的引领下,各类学会纷纷建立,“学堂学会,遍地并起”^⑤。据考证,至1898年国内成立的各类学会已不下72个^⑥。例如,1895年8月,谭嗣同于湖南浏阳创立近代中国最早的学术社团——算学会^⑦;1895年9月,康有为创立对近代中国兴办学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强学会。与此同时,西方政治学(虽已在明清之际就已经随着西学输入中国,但当时强调的多为“自然科学”,对国内政治影响较小^⑧)随着维新人士所倡导的新学通过译书著书、创办杂志等方式引入国内^⑨。西方政治学的引进,激发了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兴起与发展^⑩。19世纪末中国开始出现一些专门探讨政治问题的社会团体。例如,杨衢云、谢缵泰等于1892年3月在香港岛内建立了旨在“开通民智,讨论时事”的辅仁文社(也称“辅仁书报社”)^⑪;1895年5月江西候补典史李瑞庭等在江西南昌建立以“讲求吏治、研讨时务”为宗旨的奋志学社^⑫;1899年,梁启超、郑清璠等为了“讨论议院是否亟宜开设”而创立的政治学会^⑬等。但这些团体的章程尚未成体系,组织结构不完善且规模偏小,如辅仁学社会员仅16人,奋志学社会员为“同寅六七人”,活动范围有限,其活动内容仅停留在“阅群书,增学识”、“观时事,论天下”等较浅层面,还不能归入政治学学术团体的范畴。

1898年,维新变法的又一重要产物——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于1899年9月设立政治专门讲堂,又于1909年招收首批政治学专业本科生,这些具有开启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揭开了作为独立学科的近代中国政治学发端的序幕,也促成政治学由零碎的“知识资源”形态开始向“学术资源”形态转变^⑭。1906年,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国内随即出现了不少研究宪政与地方自治的学术团体,如地方自治研究会、宪政研究会、法政学会等。由马良、雷奋等于1906年在上海主持发起的宪政研究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其名称、宗旨、所在地、“应办之事”、入会标准^⑮。据

① 马振举:《论近代学会及其历史作用》,《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

②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第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梁启超:《会报叙》,转引自翦伯赞编:《戊戌变法》(四),第377页,神州出版社,1953年版。

④ 邢天寿:《论学会》,第27页,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⑥ 参见冈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⑦ 参见武克全:《学术社团:值得重视的社会群体资源》,《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5期。

⑧ 参见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1期。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⑨ 参见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⑩ 参见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⑪ 蔡鸿源、徐友春:《民国社会党派大辞典》,第387页,黄山书社,2012年版。

⑫ 冈杰:《新发现的戊戌时期学会及其意义》,《求索》,1993年第6期。

⑬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⑭ 参见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39页,第89页,第203—2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⑮ 《宪政研究会章程》,《申报》,1906年12月10日。

史料记载,宪政研究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上,“会员凡百五十二人,来宾四十余人”,大会上以“投票公举”的方式,选出马相伯(马良)为总干事,雷继兴(雷奋)为副总干事,夏颂莱等16人为评议员,来宾郑苏龛还在会上发表演说,勉励宪政研究会一方面能够“增长其救危履险之知识以保国家之命运”,另一方面要在思想和行动上推动立宪与地方自治^①。可见,与19世纪末创立的团体相比,20世纪初期成立的学会组织已具备了初步的章程体系,组织规模有所扩大、组织结构开始完备,活动种类逐渐丰富,学术性特征得到凸显。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学还没有完全满足“(1)学科成熟;(2)大学教育中系科和专业设置;(3)专门研究机构、学会及刊物的设立”^②的条件,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因此,这些团体并不是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学术团体,而是广义上,即“对政治现象的系统观察和深入思考”^③的学术团体(或者是关于政治的学术团体、带有研究性的政治团体),属于政治学学术团体的早期形态。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带来了一次社会大变革与思想大解放,为民主共和思想的研究与传播提供了鲜活土壤。当此之时,1913年国内第一批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毕业,意味着中国大学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体系业已形成,已具备独立培养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的能力。1915年全国性政治学学术团体——中华政治学会成立,并于1916年开始出版《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季刊(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国内大学涌现出一大批以政治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组织,如清华大学政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会、北大政治学会、清华政治学会,等等。这些组织均创办专业刊物。凡此种种,标志着历经二十载的孕育与发展,近代中国政治学学科正式形成^④。

在此背景下,一批批留学归国的政治学者,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创立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以他们完成学术训练(完成本科学业或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开始在国内从事研究、发表成果、服务政治学界为标志,可以看到有以下三代政治学家^⑤:第一代政治学家大多接受北洋新式教育并曾留学日本,20世纪20年代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员,如程树德、高一涵、陈启修、张慰慈、何基鸿、杜国庠等;第二代政治学家大多为清华学校的预备留美学生,赴欧美政治系学习并于20世纪30年代学成归国,成为国民政府时期各大学教员主体,以及国民政府“学政交流”主力,如张忠绂、张奚若、萧公权、陈之迈、王化成等;第三代政治学家学术活动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大多毕业于国内本科院校,并于30年代赴欧美留学,40年代初学成归国,如楼邦彦、周世裘、王铁崖、龚祥瑞等^⑥。20世纪40年代前后,国内处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极大地限制了第三代政治学家的活动,此时创办的学会数量锐减,会址也多限定于重庆地区。总之,在20世纪20—40年代这段时间内,这些经过多年“海外培养”的青年才俊挑起了中国近代政治学发展的大梁,引领着政治学学术团体创立与发展的潮流,成为观察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变迁的重要着眼点。他们带回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并通过创办政治学期刊,翻译国外政治学经典著作,引进、介绍与传播西方政治学说,使政治学的社会活动空间不断拓展。在此背景下,政治学学术团体

① 《宪政研究会第一次大会纪事》,《申报》,1906年12月10日。

② 参见宁骚:《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政治学卷〉总序》,《江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③ 宁骚:《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科学——〈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政治学卷〉总序》,《江汉石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④ 参见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204页。

⑤ 王向民:《民国政治学的四期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⑥ 王向民:《学科与学术:中国20世纪30年代政治学的建立》,《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

的数量开始迅猛增长,官方举办、社会创建、学校发起成立的政治研究社、政学研究会、政治研究会等纷纷涌现。这些政治学学术团体以“政治学学术”为基础,试图将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理论融入本国政治传统,寻求与本国政治文化的有机结合。尽管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其发展却彰显着近代中国政治学凝聚力与影响力的增长,并且逐渐演进为能够有效作用于当时政治实践的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

二、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概貌

(一) 政治学学术团体的数量统计与典型代表

为了解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的总体数量,并分析其生存状态,本文查阅了相关辞典、文集、丛书、期刊、报纸等历史资料,并通过对档案、年鉴等电子资源库的检索,共查到中国近代成立的政治学学术团体约120个。再根据下列条件:一是专门为研究“政治学”而成立;二是成立的时间区间为1840—1949年,即中国近代;三是首创者为直接从事政治学教学科研的研究者、师生以及政府部门热心政治研究的实务工作者;四是明确以进行“政治学”学术研究为宗旨,或以开展与“政治学”相关的学术活动为纲领;五是研究或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可以粗略统计出近50个政治学学术团体。这些政治学学术团体可以分为四类:(1)创立于1906年至1914年间,带有研究性的政治团体。如地方自治研究会、宪政研究会、法政学会、广东公会、政治研究社、法政同志研究会、政学研究会;(2)创立于1915年至1929年间,政治学学科正式形成前后、推进政治学从理念层面走向学科学术范畴的学术团体。如中华政治学会、政法协会、岭南大学政治学会、政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政治研究会、己酉学会、财政学社、行政研究会、留美中国学生政治学会、复旦政治学会、清华政治学会、东吴大学政治学会、国立暨南大学政治学会、光华大学政治学社、国际政治研究社、金陵大学政治学会;(3)创立于1930年至1935年间,作为讨论国是的主力、在价值取向上更贴近民主政治的学术团体。如中国政治学会、中国市政协会、中国地政学会、中国计政学会、中国国际学会、中国地方自治协会、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南京)、中国人事管理学会、行政效率研究会、中国考政学会;(4)创立于1937年至1949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注重现实政治(行政)问题的学术团体。如中外关系研究会、中国盐政学会、外交问题研究会、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中国政治建设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县政学会、中国地方行政学会、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财政学会、中国人事行政学会、中国驿政学会、中国行政学会、中国地方自治学会(重庆)。

(二) 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类型及分布

为对政治学学术团体作出更深入的了解,本文按照如下标准对所整理的学术团体进行了分类。

1. 根据发起、创立者的来源划分:(1)综合性大学的教学人员或学生创建的学会,如时任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的杭立武筹划建立的中国政治学会,以及由大学政治系学生发起成立的岭南大学政治学会、北京大学政治研究会、复旦政治学会、清华政治学会等;(2)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主导或参与创建的学会及协会,如中华政治学会、行政研究会、行政效率研究会等;(3)各地方性团体创建的研究会,如,地方自治研究会、广东公会等;(4)留学人员在海外创建的学会,如,留美中国学生政治学会等。

2. 根据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不同划分:(1)主张在中国实行宪政,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学术团体,如,宪政研究会。这些学术团体大多以研考西方国家之宪政为宗旨,主要目的在于联系立宪派人士,并通过创办《宪政杂志》等刊物、开展调查、举办讨论会等方式传播和普及法政知识、

为立宪派政界人士提供参考意见；(2)研究政治学某分支学科的团体。一是致力于研究地方问题的学会,包括以研究地方自治理论为主的中国地方自治学会、中国地方自治协会,以及研讨边疆政治文化及其实际问题的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二是研究行政学理论与实务的学会,包括中国行政学会、中国盐政学会、中国驿政学会等;三是专门研究财政问题的学会,包括财政学社、中国财政学会;四是旨在研究人事行政的学会,包括中国人事行政学会、中国人事管理学会、中国考政学会;五是以促成土地改革为目的而进行土地问题研究的中国地政学会;六是研究涉及到国际政治问题的国际政治研究社、中国国际学会、中外关系研究会、外交问题研究会;七是交换政治学识,联合同志,共同进行政治科学研究的同志会、公会等,包括法政同志研究会、广东公会、已酉学会等。

3. 根据学术团体所在地域划分:就本文所统计的政治学学术团体来看,这些政治学学术团体大多集中分布在北京、南京、重庆、上海四个近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体来看,北京市14个、重庆市11个、江苏省9个,其中8个位于南京市,上海市9个,广东省、四川省、浙江省、山西省也有一些政治学学术团体,覆盖了全国8个省市及地区。此外,还有1个学术团体成立于国外,即建立在美国纽约的留美中国学生政治学会。

上述学术团体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有着革新政治、变革社会的良好愿望,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阶层决定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的局限性。尽管如此,这些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在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进步的进程中依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三) 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管理体制

鉴于明末士林结社干预朝政、党争激烈而造成政局动荡的教训,清朝统治者严令禁止民间结党结社,明确规定“诸生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①。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为契机,各种学术流派、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开始结社建会,但在1904年以前出现的社会团体并未得到官方许可,它们仅是在清政府控制相对松动之时自行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1904年后,清政府颁布一系列管理社团的法律条例:《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04)、《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折》(1906)、《农会简明章程》(1907)。1909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结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②。同年,清政府制定了中国首部专门的社团法律——《结社集会律》。这些法律条例虽然承认了社会团体的合法地位,但其意图在于加强对社团的控制与管理,尤其是加强对与政治相关的结社集会的控制。例如,《结社集会律》第六条中对政论集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对带有政治色彩的社团要求相对严苛,但以政治研讨、知识传播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团体仍得到一定的发展,在1911年之前,中国已有多个带有研究性的政治团体。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陆续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社会团体进行系统管控,诸如1927年6月通过《各级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同年7月通过《各级党部与各级民众团体之关系条例》,1930年1月通过《文化团体组织原则》《文化团体组织大纲》和《人民团团体组织方案》、同年7月通过《修正人民团团体组织方案》^③,1931年2月通过《文化团体组织大纲施行细则》。其中《文化团体组织大纲施行细则》规定:文化团体的章程“须先呈请当地高级党部及主管官署备案”、“关于会务之进行,应受政府各主管机关之指挥”、文化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

① 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2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第5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参见兰图、栾雪飞:《近代中国社团立法的演进及启示》,《学术交流》,2014年第7期。

之范围之外为政治运动”、“不得妨害公共利益”^①。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40年6月颁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同年10月颁布《非常时期职业团体会员强制入会与限制退会办法》,1941年9月颁布《非常时期统一社会运动办法》(以下简称“统一社会运动办法”),1942年颁布《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等。其中《统一社会运动办法》中规定“社会运动……以发扬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尚,增进公共福利,辅助政令推行为目的”,社会运动之推行应提前报备主管官署核准并进行督导;《组织法》则对人民团体的内部机构设置、设立流程、章程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②。

尽管如此,社会团体尤其是涉及政治学的学术团体仍然顽强地生长与发展起来。近代中后期组建的政治学学术团体在名称、宗旨、章程、机构设置、人事安排、会员管理、组织纪律、社团活动安排等方面更加规范和完善,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组建政治学学术团体的传统逐渐形成。这些政治学学术团体大多以学术界人士与党政官员为主体,研究范围较早期更加广泛,活动内容也更加丰富。诸如,1915年冬成立的中华政治学会^③,这一学术团体是由学界与政界的精英共同创立的,学会入会条件较宽松,会员中有很多是当时清华学校的在职教师与清华留美归国的学生。中华政治学会以“鼓励社会和政治科学研究”^④为宗旨,它本身既未限制会员的具体研究方向与领域,也没有制定统一的学术规划,而更多的是向会员提供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信息以及政治学学术交流与讨论的场所,为此,学会创办了专供会员使用的政治学会图书馆。

相比较而言,较典型地代表了近代中国非官方政治学学术团体管理体制的是1932年9月由杭立武、高一涵等在南京发起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杭立武撰文称,“盖政治之良窳,必由其历史之背景,社会之环境所造成。倘能得专家若干人,先从事实之上研究入手,然后根据学术上之原理,参照本国之实情,对症下药,筹思切实计划而倡导之,则政治上之利弊,非不可藉以兴革也。”因而成立了这一“纯政治学术团体”^⑤。在成立大会上,高一涵、卢锡荣、刘世舜等数十名到会者推举杭立武为主席,并在会上报告了该会“促进政治科学之发展、谋贡献于现实政治、帮助后学以研究方法”^⑥的宗旨以及学会筹备的过程。报告完成后立即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的第一次大会,会上通过了学会会章。会章规定会员大会为学会之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学会设干事会(1935年更名为“理事会”,并作出相应调整),设干事11人,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负责办理会务,任期1年。干事会中设总干事及副总干事各1人,由干事互推;另由总干事推举书记、会计、编辑主任及出版主任各1人。中国政治学会是全国性的政治学学术团体,但自1933年《审查新会员资格暂行标准》实施后,只有满足下列四项条件之一者才可取得会员资格:(1)现任大学教授(1936年修正为“现任大学政治学系教授”);(2)曾在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政治学或其相关学科两年以上且出版过著作;(3)在国内研究机关从事政治学或其他相关学科之研究工作且有成果;(4)对政治学有特殊贡献。学会以“阐明政治原理、讨论政治问题”为主要活动内容,将各种实际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涉猎范围极广,包括外交策略、宪法草案、地方行政、改进吏治、大学政治系课程标准、政治机构建设、地方自治、战后和平等问题^⑦。同时,还刊行政治学杂志、

①② 蔡鸿源,徐友春:《民国社会党派大辞典》,第426页,第450页,第451页,第454页。

③④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74页,第27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⑤ 杭立武:《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宣言》,《时代公论》,1932年第23期。

⑥ 《中国政治学会昨在京开成立会》,《中央日报》,1932年9月2日。

⑦ 参见王向民:《学科与学术:中国20世纪30年代政治学的建立》,《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

编译政治学书籍,并为开展政治学科范围内多门分支学科之研究,特设立了分科研究会^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旧中国遗留下的社会团体采取了差异化的管理措施,对无益于社会、人民的团体进行了清理^②,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也开始调整与整合。1950年9月政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次年3月内务部颁发《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等法律法规后,新中国的政治学学术团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宗旨与特征

(一) 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宗旨

宗旨是一个学术团体发展的核心要义,指明了其存在的目的与价值^③。近代中国的政治学学术团体皆是围绕着特定的宗旨开展各项学术活动,尽管不同团体的宗旨之具体内涵有所差异,但其大义无非是聚集荟萃政治学界同仁和关切国事的人士,交流政治学最新研究进展、探讨时事政治、传播政治学知识,以推进中国之政治理论建设与政治实践发展。

1. 推动政治学学术与学科发展。近代中国有不少以推动政治学学术、学科发展为目标的政治学学术团体。如中国政治学会,将“促进政治科学之发展”列为学会设立的首要目的^④;中国行政学会,则将“研究行政各问题”作为学会的中心任务^⑤。成立于1919年,被称为高校中“历史最久”的政治学会^⑥——岭南大学政治学会,以“联络对政治有兴趣之同学,作政治学术之研究”^⑦为旨趣,通过举办各种演讲会、座谈会、辩论会,带领该校政治系同学与其他对政治有研究兴趣同学,共同研究政治学;清华高等科学生先后于1920年、1927年组织成立的政治学研究会、清华政治学会亦是如此。政治学研究会以“纠合同志,公共讨论及研究一切有关于政治之问题及学理”为宗旨^⑧,一方面,通过开展政治学名人演讲会与会员研讨会等活动,探究中国政治问题,扩充会员知识;另一方面,则为将来政治学系学生“肄业专科预备”。清华政治学会将“研究政治学术,联络感情,并辅助清华政治系之发展”作为学会宗旨^⑨,通过出版《政治学报》刊物等学术活动,不仅开拓了会员的学术视野,提升了其政治学研究能力,还促进了政治学学术理论与政治学系发展与改进。

2. 推进中国政治之改良与变革。推动中国政治之改良与变革是中国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重要工作方向。如,1906年成立的宪政研究会,该学会以“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以俟实现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⑩为宗旨,主张研究宪政思想,以辅佐政府建立宪政制度,为宪政的施行奠定思想、理论上的基础,在先后于1923年、1928年创立的留美中国学生政治学会、国际政治研究社,会员们皆怀揣着“法治之盛,足与先进立宪国比隆”的美好理想,分别以“研究政治学理,讨论政治问

① 《中国政治学会十年简史的叙述》,《中央日报》,1942年11月6日。

② 参见王凛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社团管理特征及其启示》,《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③ 参见吴迪:《基于使命的中美科技社团能力比较分析》,《学会》,2018年第1期。

④ 杭立武:《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刍言》,《时代公论》,1932年第23期。

⑤ 王云五总编辑、张金监本册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七册·行政学》,第2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⑥ 《政治学会消息》,《南大青年》,1929年第17卷第24期。

⑦ 《岭南大学政治学会会章》,《历史政治学报》,1947年第2期。

⑧ 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48页。

⑨ 参见《清华周刊》,第543—545页,1927年第423期。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至1937》,第256页。

⑩ 《宪政研究会草章》,《申报》,1906年12月10日。

题”^①、“研究国际政治的趋势与实际问题,以作国内政治之参考;用敏锐的观察、合理的推论,以作国际政治上的批评”^②作为立会宗旨,企图通过观察英、美等“民治先进国”的政制,作国内政治之参考,“庶幾学理与事实”,“以俾科学治国之道,能施用于中国”^③。还有1939年成立的中国政治建设学会,该学会践行“研究政治理论及其实施,以助成中国之政治建设”^④之宗旨,在研究政治学学术与理论的基础上,将中国之地方行政、财政金融、交通、边事、战区、法制、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外交、宪政等问题置于研究范围内,以期贡献所学,促进民主宪政之发展,完成中国之政治建设。

3. 研究各项政务以促进其发展。近代中国的政治学学术性团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研究政治学中某一分支学科的,例如,在人事行政学领域,1934年创建的中国人事管理学会及1941年建立的中国人事行政学会主要致力于研究人事行政理论与人事制度,总结国外人事管理的先进经验,在学术上促进人事行政成为“自成体系之独立学科”,推进“人事行政实务”的发展^⑤。在财政学领域,1941年组建的中国财政学会,则秉承着“研究财政学术,讨论财政问题,提供财政方案,协助国家财政建设”的宗旨,以期通过“财政学术之讨论研究、财政政策之宣扬协赞、财政方案之设计建议,财政资料之调查统计,财政刊物之编译出版”^⑥等,为促进国家财政建设、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提供行动方案,并为推动财政学新学科发展做出贡献。此外,在地方行政学、外交学、驿政学(旧时以通信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等领域都设有专门的学术团体,这些学术性团体,都期望通过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深入研究,来促进政府各项政务建设,推进政府行政有效运行。

4. 研究并推进地方自治。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些研究地方自治理论的学术性团体,如,1906年创立的地方自治研究会,1934年创立的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南京)与中国地方自治协会,1945年成立的中国地方自治学会(重庆)。这些团体中,中国地方自治学会(南京)重在“研究地方自治理论与实施方法,并促进地方自治事业”^⑦;中国地方自治协会以“依据总理遗教,阐扬地方自治之理论及实施方案,调查全国各地之自治实况并协力初期完成”^⑧为目标指向;中国地方自治学会(重庆)以“地方自治之理论与实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实现三民主义,促进五大建设”^⑨。

(二) 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特征

1. 具有留学背景的政治学者是学术团体创立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近代中国的政治学者大都有海外留学的教育背景^⑩,他们回国后纷纷通过办刊结社等方式传播政治学知识,成为学科启蒙的先行者与团体创立的倡导者。如,曾于19、20世纪之交在日本留学的易宗夔、赵翰纶等回国创立了行政研究会等团体;而在同一时期成立的中华政治学会中,会员内“十九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十七八是教育教学稍有名望的”^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赴欧美留学的中央大学政治系主

① 《留美中国学生组织政治学会》,《教育杂志》,1923年第11期。

② 《国际政治研究社发起宣言》,《新闻报》,1928年12月15日。

③ 《留美中国学生政治学会成立》,《申报》,1923年10月24日。

④ 《中国政治建设学会成立宣言》,《政治建设》,1939年创刊号。

⑤ 参见《发刊词》,《人事行政》,1942年第1期。发刊词中提到“人事行政顾为一种专门之事务,但在学术上实为一自成体系之独立学科,在政治上则为关系重大之行政实务”。

⑥ 崔庆修:《史料:中国财政学会筹备成立之经过》,《财政学报》,1942年创刊号。

⑦ 《中国地方自治学会简章》,《中央日报》,1934年5月14日。

⑧ 《中国地方自治协会成立》,《民报》,1934年2月5日。

⑨ 吴锦鏞:《中国地方自治学会成立之经过》,《地方自治专刊》,1945年第1期。

⑩ 参见王向民:《中西璧合: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

⑪ 陈翰笙:《临时抱佛脚》,《现代评论》,1924年第3卷第53期。

任杭立武于南京创办中国政治学会,该学会45位发起人:“杭立武、王世杰、周鲠生、萧公权、陶希圣、高一涵、刘师舜、杨杏佛、陈逸凡、钱昌照、谭绍华、梁朝威、张忠绂、陈石孚、萨孟武、刘崇本、陈希孟、梅思平、田炯锦、马约、陈经远、皮皓百、卢锡荣、远道丰、唐量礼、程天放、端木恺、张慰慈、吴之椿、杨公达、李迪俊、雷震、向理澜、张奚若、钱端升、徐佩希、马文煊、罗隆基、吴颂皋、浦薛凤、傅坚白、章澜若、刘乃诚、李圣五、时昭瀛”,这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有着欧美留学背景的政治学学者^①。此外,还有1939年创立的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的创办者臧启芳曾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加州大学研究院、伊利诺伊大学;经常为该会会刊《中国行政》撰写文章的王绍之、陈鹤声等皆为留德博士^②。这些有留学背景的政治学家较为系统地接受国外政治学教育,学成归国后,践行所学,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

2. 青年知识分子是学术团体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对于政治学这一西方的舶来品,许多近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在通过阅读报刊书籍、接受新式学堂教育等方式对其有所接触后,燃起了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兴趣,成为政治学学术团体发展重要力量。如,在1920年11月政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清华高等科学生谢文炳、沈宗濂、黄卓繁分别被推选为研究会书记、会计、干事。为更好地对政治学有关的问题与学理进行研究,在校长金邦正、政治学教师余日宣、沈楚劬的指导及三位青年学生的精心组织下,研究会每周都开展一次会员研讨会^③、名人演讲会,以加强会员间学术交流,促进其政治学知识的增长;1921年2月,北大学生领袖曾青云发起并成立了政治研究会,在杜国庠、王世杰、高一涵、陈启修、陶履恭、张祖训等^④政治学教授的指导下,通过读书、研讨、翻译、编著、讲演等会务,丰富了社团活动,同时也促进了北大师生的政治学学术研究与交流^⑤;此外,在东吴大学政治学会、光华大学政治学会、国立暨南大学政治学会、金陵大学政治学会、中华大学政治学会等政治学团体中,青年学生或作为学会的创立者,或作为学会活动的召集人、重要的参与者,组织开展或积极参加研讨会、演讲辩论等活动,撰写论文、编译书刊,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学团体学术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推动了政治学团体的发展。

3.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相关政治学学术团体服务于现实的重要践行者。如,1923年北洋政府“为比京研究官制万国公会议事材料之准备”而创立的中国首个行政研究团体——行政研究会^⑥,该研究会章程中明确规定:“行政研究会,附设于国务院法制局。本会置会长一人,以法制局局长兼充,本会会员,由会长于下列人员中聘任之:(1)法制局参事、编译;(2)各部院荐任以上职员。”^⑦先后担任行政研究会的会长易宗夔、赵翰纶,同时也是法制局的局长^⑧。基于“中国行政的刷新,也不是单从欧美搬来的一些文官制度……有待于将中国的整个行政机构与运用作详细的科学的检视和研究”的认识^⑨,1934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组建了旨在“研究中国行政问题以便推行行政改革、增进行政效率”的行政效率研究会^⑩,该研究会会长系时任内政部部长的甘乃光,副会长张锐不仅担任过天津市政府秘书也是内政部参事;研究会的专门委员,如,

① 魏辅:《中国政治学会之成立及其初期学术活动——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六十周年》,《政治学报》(中国台北)第14期。

② 参见杨沛龙:《中国早期行政学史:民国时期行政学研究》,第68页,第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③ 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48页。

④ 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216页。

⑤ 参见孙宏云:《由“经济”到学术: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建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⑥ 参见李俊清:《中国第一个行政学会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1期。

⑦ 《阁议通过行政研究会章程——为出席比京研究官制万国公会之预备》,《申报》,1923年8月30日。

⑧ 李俊清:《政治与行政史论集》,第224页,第225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⑨ 《行政效率研究会设立之旨趣》,《行政效率》,1934年第1卷第1号。

⑩ 孙宏云:《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孙澄方、张忠绂、苏松芳、区家英、李朴生、谢贯一等大多为党政机关的官员^①。此外,“中央各机关办理计政人员”^②、“在政府机关主管人事行政专职者”^③、“现任或曾任考选铨叙机关之职务者”^④等党政机关工作者,是中国计政学会、中国人事行政学会、中国考政学会等学术团体的重要组织参与者,他们与各领域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政治学理论与实务,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理论研究与政府实践的有机融合,使政治学学术团体“经世致用”的功能得以彰显。

总之,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所秉持的宗旨及其体现出的特征无不是其所处时代背景的折射,具有较为明显的“近代”色彩。同时,政府的严格管控使其生存空间、功能发挥以及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作用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⑤。

四、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的运行成效

(一) 创办政治学刊物,传播政治学知识

戊戌变法之后,维新志士就将报刊视为除学会之外,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的又一重要工具,因而出现了“以书报为起点,而以学会为归宿”的论断^⑥。20世纪初,创办和编印书刊杂志更是成为许多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基本活动方式。前文提及的近50个政治学学术团体中,就有近30家创办了刊物。诸如,1906年于上海成立的宪政研究会,为“求尽国民参与政事之天职”^⑦,会员雷奋等出版了《宪政杂志》,杂志中刊载了大量介绍东西方宪政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与阐发宪政理论的文章^⑧;由甘乃光等人于1934年12月创立的行政效率学会,则出版《行政效率》(1936年改名为《行政研究》)月刊及其英文版“Chinese Administration”作为“研究中国行政效率问题”的主要园地。《行政效率》月刊主要刊载来自政府实务部门人士或政治学教师的研究成果,如行政效率研究会专门委员会成员江康黎、张锐、薛伯康,清华大学教师陈之迈、沈乃正,中央大学教师王季高、张汇文等,发表的行政研究论文、调查报告^⑨,因其观点新颖又切合实际,《行政效率》(《行政研究》)月刊行销甚广、供不应求,成为当时“全国公务员之唯一读物”^⑩,为从政人员及学者发表促进政府改革意见,交流行政效率改进经验提供了平台,在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甘乃光则凭借其在《行政效率》(《行政研究》)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及出版的《中国行政新论》一书,成为了民国时期行政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此外,还有中华政治学学会的《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季刊、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的《中国行政》月刊、中国政治建设学会出版的《政治建设》月刊及《政治建设小丛书》等影响广泛。尽管不同的政治学学术团体创办的报刊内容各异,但正如严复所言“虽复体例各殊,宗旨各异,其于求通之道则一也”^⑪,这些报刊皆倾向于关心国家、政界大事的报道,寻求政治变革改良之道,成为当时普及政治新知,呼

① 参见杨沛龙:《中国早期行政学史:民国时期行政学研究》,第50页,第64页。

② 《附载:中国计政学会一览》,《会计杂志》,1934年第3卷第5期。

③ 《附录:中国人事行政学会组织缘起》,《人事行政》,1942年第1期。

④ 《中国考政学会简章》,《考政学报》,1944年创刊号。

⑤ 参见徐秀丽:《中国传统社会的社团及其与现代社团的区别》,《文史哲》,2009年第2期。

⑥ 《蒙学会公启》,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⑦ 《宪政研究会草章》,《申报》,1906年12月10日。

⑧ 参见方平:《清末民间社团的发展空间及其限度——以上海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⑨ 参见杨沛龙:《中国早期行政学史:民国时期行政学研究》,第63页。

⑩ 《行政效率》第2卷第3期封面,1935年2月1日出版。

⑪ 王栻:《严复集》,第二册,第45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吁政府改良,开展学术交流与研究的重要园地。

(二)开展政治学学术活动,启迪民智并推动政治学人才培养

诸多政治学学术团体通过定期集会、研讨会、讲演会、演说辩论等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来增进会员间“互换智识”及向民众普及政治学知识,以激发民智,加速新式政治学人才的培育。诸如,1920年组建的政治学研究会为研讨政治之问题与学理,每周都会举办形式多样的研讨会。1922年上学期,研究会在顾问老师江之泳、余日宣等的指导下,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就中国、日本政府,中国古代之政党史,欧洲政治学史等议题进行了报告与讨论^①;下学期,研究会还定期举行了论文报告与研讨会,并规定“每人择作一关于中国之题……由全体会员及顾问分别批评指正”^②。此外,在“演说辩论是今日处世之要求,而尤与他日从事实际政治者有莫大之关系”^③之观念的影响下,邀请政治学名家前来讲演、举办演讲辩论赛也是政治学团体开展集会活动的重要方式。例如,政治学研究会每数星期都举行一次名人演讲会,非会员也可以参与旁听^④;1927年成立的清华政治学会经常邀请国内外学术名流,如张君勱、沈宗濂、克拉克(Clark,《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主笔)、邓肯(Duncan,燕京大学政治学系美国教授)来演讲,演讲主题包括“马克思政治论与中华民国之建设”“欧洲政治状况”“中俄关系”“美国关税的政治问题”等^⑤。1928年成立的东吴大学政治学会采取“分组合作”的研究方法,分为“国际、比较政府、地方政府、政治学说、中国政治问题”五个小组,各小组每两周组织一次集会讨论^⑥。可见,政治学学术团体通过多种形式的集会,启迪民智,提升民众政治意识与能力,进而以达到开化政俗、培育人才的目的。这些学术团体已然成为培养新式政治学人才的土壤,造就了不少在学界、教育界、政界颇有建树的政治学人才。

(三)从事翻译著述,介绍引进政治学理论和思想

近代诸多政治学学术团体都非常重视介绍、引进西方经典政治学著作。于1915年成立的中华政治学会为更好地将《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英文版会刊上刊载的外国学者研究成果提供给中国读者,特意将这些文章翻译成中文并汇编成册,作为岁末增刊,一年出版一次;1923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政治学会的会章中明确将“翻译、编著”作为学会会务之一^⑦;1932年成立的中国政治学会也将“编译政治学书籍”列为学会的事业范畴;而早在行政效率研究会正式成立之前,该研究会的筹备工作组就已经聘请张忠绂、江康黎、张锐、王云五、孙澄方等学者编译“行政效率丛书”,包括如薛伯康的《中美人事行政比较》、日本学者渊时智的《文书整理法之理论与实际》、美国学者怀特(L. D. White)的《美国行政动向论》等,以系统地介绍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1939年成立的中国政治建设学会会刊《政治建设》特设“译述”一栏,专门刊载国外学者关于现实政治问

① 参见《清华周刊》,1922年第236期、第241期、第238期。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50页。

② 参见《清华周刊》,1922年第252期。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52页。

③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0年第237期。

④ 参见《清华周刊》,1920年第199期、第200期。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48页。

⑤ 参见《清华周刊》,1927年第425期;《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2年第460号、1932年第468号。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59—261页。

⑥ 参见彭望栋:《政治学会》,《东吴年刊》,1929年第1期。

⑦ 参见金安平、李硕:《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第220页。

题的文章^①。这些由政治学团体成员翻译的文章和著作,将国外政治学理论引介至国内,不仅推动了东西方政治学学术的交流,也为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洋为中用”的丰富资源。

(四) 组织社会调查,促进政治学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近代中国的政治学学术团体中,不少社团十分重视“躬行实践、知行合一”,组织会员开展了大量旨在“广见识,以备考究之用”的社会调查活动。行政研究会将“调查各国法制”视为一项重要任务^②;中国人事管理学会为“明瞭各机关人事管理实施状况,以为研究及改进的根据”,曾对各机关进行过“实施状况调查”,并组织会员“亲赴各机关观察工作情况,特别注意人事方面”^③;专注于“研究人事行政之理论与实务”的中国人事行政学会也将“人事行政业务之统计与调查”列为会务之一^④;清华政治学会组织会员开展过多次参观与实地调查活动,如曾组织会员在1928年至1934年的春节假期参观外交部、英美公使馆、河北省政府、北平市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外交大楼、中国政治学会、社会调查所等机关^⑤;由北京大学学生曾青云等于1921年2月发起成立的政治研究会,于1923年5月30日,组织北大学生政治考察团,依靠北大教职人员及学生的经济捐助,赴南京、上海、广州、天津、济南,及香港、日本、朝鲜等国内外地区进行实地考察^⑥。国立暨南大学政治学会会员为“实地参摩市政,及充实见闻”,在本校教授的带领下前往上海市政机构参观,以期获得有关市政实际资料,“俾与在校讲习理论,互相参证”^⑦。可见,一些政治学学术团体将“躬身践履”的社会调查作为学者的责任与义务,力求通过实地调查参观活动让会员洞悉中国政治体制及国民政治思想之“要害”,以避免政治学学术研究“空中悬浮”。

五、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社会影响

(一) 凝聚各方人士,奠定近现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组织基础

鸦片战争后,对“广兴学会”影响较大的“群学”(社会学的旧译名)传入中国。最早提出“群学”思想的严复在《群治》篇中指出:“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其无可如何之势也”^⑧。作为联络政治学同仁,研考政俗、开通风气的有效载体,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创立正是“合群”的题中之义。这些学术团体将有着共同学术追求的留洋学者、青年学生、政府官员、民间知识分子等聚合起来,并通过制定学会章程、建立组织制度等方式,以构建一个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有广泛共识的学术团体。

在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创立与发展中,其鲜明的特性得以彰显:(1)学术团体依据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来管理,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自治性;(2)作为一种非临时性的集合体,其组织形态和结构具有稳定性;(3)学术团体成员来源广泛、身份平等与出入学会自愿等特点,使政治学团体具有明显的开放性;(4)学术团体领导层的确定以及重要事项的决定都是在广泛征求团体成员意见基础上完成的,其运行具有民主性;(5)学术团体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都是围绕着政治学学

① 参见《政治建设》,目录页,1939年第1卷第4、5期。

② 李俊清:《政治与行政史论集》,第224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 何清儒:《中国人事管理学会三年来工作概况》,《人事管理》,1937年第5期。

④ 参见杨沛龙:《中国早期行政学史:民国时期行政学研究》,第69页。

⑤ 参见《清华周刊》,1928年第435号、第446号;《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0年第165号、第240号。转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70—271页。

⑥ 李浩泉:《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⑦ 《校闻:本校政治学会同学参观上海市政机构,对市府市议会均作翔实之访问》,《国立暨南大学校刊》,1948年第14期。

⑧ 王栻主编:《严复集》(五),第134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术问题,而非以营利为目的,社团活动具学术性与公益性。^①

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所具有的上述特性,表明其已突破“以独术治群”^②传统的束缚,基本具备了现代学术社团的要素^③。同时,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这些特性,不仅为其凝聚与整合功能的发挥提供了保障,而且奠定了近现代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组织基础。它们将分散的研究力量集聚起来,并通过“团体”的力量将经过整合后的更具系统性的政治观点、政治见解传播出去,使其影响成倍地放大,进而达到在整个社会创设政治议题、引导政治舆论的效果。同时,以中华政治学会(北京)、宪政研究会(上海)、中国政治学会(南京)、中国行政学学会(重庆)等京、沪、宁、渝等地的近代政治学团体为龙头辐射带动国内其他政治学团体,在强化公众政治意识、建立中国本土政治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创新政治学研究,推进近代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

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对政治学研究的创新,表现在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在研究目标上,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尝试将西方政治学原理与中国本土政治现实相结合,以激发本土政治学的兴起和发展;在研究内容上,大部分政治学团体围绕着国家现实政治问题,对国家制度构建、政府制度建设展开有针对性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既重视对政治学经典文献的分析,也注重实地调查、参与观察等方法的运用。另外,为推动政治学科本土化发展,政治学学术团体不仅尝试用中国政治学话语解读西方政治学思想和理论,还努力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此外,诸如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建设学会等对国内政治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团体,其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政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也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进路进行了多方探索。立足现实国情、具有国际视野、担当学术责任,是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所展现出的鲜明学术品格。

(三) 重视社团育人,开辟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面对19世纪末人才凋敝,政治生活毫无生气的境况,康有为发出“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④的感叹。梁启超亦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⑤,尤其是“经世之政才”的培养,他指出“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也”^⑥。“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⑦,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组建,成为造就“经世之政才”和联结广大政治学精英的重要途径。它不仅能够“使海内学人声气相通”、“集天下之心思耳目,聚天下图书器物”,成为互通学识、培养政治学人才的重要平台^⑧,也为政治学学术团体成员参与政务改良、政治变革提供了渠道和机会。自20世纪初带有研究性的政治团体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众多的政治学学术团体培养了大量人才。如曾为政治学研究会会员的李迪俊、王化成、翟恒、张锐、吴文藻、张忠绂、施滉、梁朝威、金通艺、张彝鼎、张企泰、高荫棠、王造时等^⑨;曾为清华政治学会会员的戴克光、湛志远、张馥、尚传道等^⑩;曾为国立暨南大学政治学会会员的王贯一等;曾为北大政治学会(1929)会员的

① 参见朱英、魏文享主编:《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第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说群序》,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页,中华书局,1941年版。梁启超在《说群序》中说“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何谓独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虞和平认为“独术”为封建专制下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以专制的“独术”治群则群力弱,以民主的“群术”治群则群力强。

③ 参见郭凡:《清末民初广州新式社团的萌发》,《天府新论》,2016年第4期。

④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申报》,1895年12月4日。

⑤ 梁启超:《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三),第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⑥ 曲广华:《戊戌维新精英对十九世纪人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学术交流》,2000年第6期。

⑦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申报》,1895年12月4日。

⑧ 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第173—17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⑨⑩ 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第255页,第258页。

夏次叔等。他们或成为从事政治学教育与研究的政治学家,或成为从事政治实务的政界领袖,均对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政治学人才,开辟了通过社团育人的人才培养路径。

(四) 参与社会政治,实现政治学学术团体的现实价值

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学学术团体,大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对政治改革、政务改良等政治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主张,还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政治实践:(1)围绕立宪问题开展活动。清末新政实行前后,出现了诸多研究宪政问题的政治学学术团体。诸如,在清政府即将颁布实现预备立宪之际,为“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而“考查政俗,研究得失”的宪政研究会成立,在宪政知识的普及、敦促清政府尽快召开国会、实行立宪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2)促进民主共和的实现。在孙中山提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②之后,以“讨论法政问题,随时发表言论辅导国会、政府、法院之不逮”为主要任务的法政研究社等致力于推动民主共和政体实施的政治学团体纷纷建立;(3)推动政府实务问题的解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某一领域政府实务的政治学团体,诸如研究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中国人事管理学会、研究考选铨叙之学术制度的中国考政学会、研究财政学术探讨财政问题的中国财政学会、研究治边建设的中国边疆学会与中国边政学会、研究政府行政事务的行政效率研究会、中国行政学会及中国行政问题研究会等,它们通过对政府各项政务的考察,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为促进政务改良积极建言献策;(4)寻求和摸索中国政治的出路。大部分近代中国的政治学学术团体,都把政治学学术研究与中国未来的政治进路联系在一起,将“研究政治学学理,探讨实际问题,提供政策方案,期于国家政治建设有所贡献”作为团体追求的主要目标,例如,旨在“研究政治理论及其实施,完成中国之政治建设”的中国政治建设学会等。

六、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团体的发展历程,展现了近代学术团体艰难曲折的生存境况和顽强奋发的生命力度。从带有研究性的政治团体在20世纪初的出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政治学学术团体以“合一群以振中国”为目标,围绕着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寻找中国政治变革图强的未来进路而展开的翻译著述、报刊创办、学术集会、社会调查、政治参与等一系列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不仅发展成为相对完整、规范的社团体系,而且开创了知识分子融入政治学界的重要传统。参加政治学学术团体不仅是政治学者个人学术追求的体现,还成为政治学者获得学界认同和接纳的重要标志。最后,需要提及的是,近代政治学学术团体所拥有的严谨的学术生活、“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以学术为志业的精神品格以及以学术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是我们今天建设政治学学术共同体时仍需传承与接续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王枫云、刘鉴萱,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省广州市,510006)。

(责任编辑:林立公)

① 参见黄建:《清末新政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近代化》,《中州学刊》,2014年第9期。

② 王向民:《民国政治学的四期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